

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论”与村治模式型构的双重维度

王秀芬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大庆 163319)

摘要: 村民自治是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把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和整体分析的框架, 认为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应体现为自发性演进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村治模式交互运用, 而总的趋势则是由“人造的秩序”向“自生自发的秩序”过渡, 即由国家权力支持的外在强制型转变为村庄自主内生的秩序。

关键词: 自生自发的秩序; 人造的秩序; 村民自治; 自主内生; 强制性变迁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767(2008)01-0093-04

Hayek's the “Social Order Dualism”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Villager Autonomous Mode

WANG Xiu-fe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eilongjiang August First Land Reclamation University, Daqing 163319)

Abstract: Villager autonomy is deemed to be an effective way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mode to which was probed by scholars multiply in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ed it's own style of the framework for rationales and overall analysis out of Hayek's "social order dualism", that the author called for two modes for villager autonomy, reflected upon, the spontaneous evolution and the compellent vicissitude working mutually. While the trend for all in the dualism should be a transition from the man-made order to the spontaneous one, namely, from the order of compellent state power to the one of self-dependence in village.

Key words: spontaneous order; man-made order; villager autonomy; self-dependence; compellent vicissitude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 对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的经济后果及社会结构的发展等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秩序二元论”是其庞大的自由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社会秩序分成两种: 一种是“人造的秩序”或“组织”, 推崇理性至上, 认为凭借人的理性, 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构成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 因此它强调秩序的可操作性, 将社会秩序看作是组织中一致行动的结果, 是人有意而为的产物; 一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或“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 主张理性的限度, 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滥用, 认为只有在积累性进化的框架内, 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

的发挥作用, 因此它强调秩序的自发性和自愿性, 将社会秩序看作是经过个人之间的自我调适而形成的。在这两种秩序的类型构中, 哈耶克极力推崇“自发的秩序”, 认为该秩序避免了“人造的秩序”的局限性而造成的障碍, 使个人自由发挥其创造力, 有可能最大程度的运用分散于个体之中的知识, 从而实现社会文化、道德信仰、经济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化发展。

虽然哈耶克的思想理论生发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之中, 虽然其终其一生都在批判社会主义理想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但这并不能遮蔽哈耶克思想本身的价值。事实上,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 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论”为我国村治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村民自治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发展于 80 年代, 90 年代以来迅速普及, 成为凸现于中国农村的一道亮丽的政治景观。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

收稿日期: 2007-11-0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0188)
作者简介: 王秀芬(1979-), 女,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 硕士, 助教, 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及教学工作。Tel: 13945601256; E-mail: fencheng7976@tom.com.

解体,国家采用“乡政村治”的方式治理乡村,即国家在乡村的基层政权设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依法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权利。村民自治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在农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之中,政治发展十分不平衡,如何实现村的有效治理仍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而要实现村的有效治理,首先就涉及到村的治理模式问题。村民自治秩序模式的选择对实施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诸多学者对中国村民自治模式做过多角度的探讨,其中,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只能是政府推进型;也有学者认为只能是自发演进型;还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自发演进型相结合的道路,即以政府推进为主导,辅之以社会与民众内在推动演进的道路。本文独辟蹊径,把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和整体分析的框架,认为两种村治模式交互运用,但强调内生力量的主导作用,总的趋势是由“人造秩序”向“自生自发”秩序过渡,即由国家权力支持的外在强制型转变为村庄自主内生的秩序。

1 “自生自发的秩序”:村民自治的自主之维

关于“自治”,马克斯·韦伯曾作过经典阐述:自治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由外人制订团体的章程,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订章程(而且不管它是如何进行的)^[1]。自治最一般的含义是指自我统治、自我管理或自我治理,它应该是官治的反面,即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而毋庸他人过问与管理的一种态度。村民自治正是农村民间社会实行的非国家、非政府的自我管理,是村民通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

首先,村民自治的含义昭示了村民自主、自律、自组织是村民自治基本的价值向度,因此其自身蕴含的价值理性要求村治秩序必须是一种基于村民集体认同的自主自律的“自生自发秩序”。

作为自主自律的“自生自发秩序”,从根本上说,村民自治的价值理性应体现为民主取向,即强调自由、平等、妥协、宽容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也是秩序内生的基础。它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专制与服从”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灌输给大众的是以“服从”为主体的思想意识,并沉淀为一种价值取向。与专制相对应,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而取得^[2],秩序的类型依据

“协商”而定,则体现了民主价值取向。而民主的根本含义则在于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涉及到人民和国家权力的内在关联,保证人民不受公共权力的侵害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村民自治虽不是国家层面的民主。但它提供了一个实现农村社区民主的制度框架,同时它也成为村民同政府博弈的有力工具,民主正是在这种点滴博弈中,在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正是这一过程使村民自治的价值理性得以凸显,公民的理性精神得以成长,并在民主的演练中锻炼了农民的民主管理能力,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农民逐步熟悉和习惯于民主的操作规程,可能生发出一种基于长期基层民主所训练出来的宽容与妥协精神,培养出农民理性独立的政治品格^[3]。借助这种理性精神的熏陶,必然形成一种新秩序,即民主政治。然而,如果不改变“专制与服从”的价值取向,不在实践中训练公民的民主能力,民主意识不可能生发,公民素质也难以提升,也就不可能形成科恩所称的“民主的前提”,即如果人类不能联合在一起制定法则并服从所制定的法则,如果人类不能互相讲理,互相理解,那就有理由说民主只是空想^[4]。简言之,民主的前提就是人类本身的理性能力,而在村民自治的实际操作中则表现为村民自治的价值理性,基于此,村民自治才真正包含了民主的成份,而不至成为一种外装。

其次,鉴于人之“理性不及”,村民自治秩序只能是自发生成的。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5]。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在两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一方面,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的运作的方面有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自身而检查它自身的运作。而另一方面,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个人理性乃是根植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规范之中的系统,所以他无法摆脱生成和发展它的传统和社会而达到这样一种地位,亦即那种能够自上而下地审视它们并对它们做出评价的地位^[6]。的确由于理性自身的限度,它不可能超越自身而设计和构建出一劳永逸的完整的制度与秩序,秩序产生的内在机理并不是人之理性所能清晰把握的。事实上秩序的进化始终导向于发现尚未知晓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是在尝试错误中逐渐得到明晰。

众所周知,村民自治发源于人的理性设计之外,是在体制性秩序因解体而缺位的境况下自发产生的。“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空管我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盗,老乡把牛拉进房子里与人同住一室,这总也不是长久之计

吧?春耕在即,伙着用的渠道总该理一理,人畜也不能每天都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属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管,还能傻乎乎的等别人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地已经包了。生产队不存在了,队长也就没有名分了,再出头管事名不正,言不顺。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呢,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我们村里的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称呼,既符合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7]”。这就是当初动议选举村委会、开展村民自治的合寨村村民韦焕能的现身说法,他的这段心路历程彰显了村民自治秩序在农村诞生的全部逻辑,而村民自治的自生自发性由此亦可见一斑。

村民自治的普及与实施对于我们来说也依然存在着太多的可能性和未知性,因为理性自身的有限性,我们不可能把握村民自治的总体的知识,若采用集中的手段只会将社会带往“通往奴役的道路”,哪怕政府的宏观调控或集中计划再周密详实,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理性是有限的,良好的初衷可能会成为灾难的来源。因此,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的多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的少借助于强制,……深思熟虑的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的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8]。即受到知识的局限性,村民自治秩序构建的原则必须强调对竞争法则的尽可能充分的利用,强调更多的利用乡村自发的社会力量,强调分权的重要性,即强调自治权力,让乡村社会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要知道秩序应“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9]。

总之,村民自治即意味着一种非强迫的村治秩序,体现的是村民独立自主的生存模式。

2 “人造的秩序”:村民自治的规制之维

哈耶克虽推崇自发秩序,但也意识到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没有某种命令结构的情况下也是无法存续的,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会遵循某些规则,原因是他们的环境以相同的方式展示于他们;他们也会自发遵循一些规则,这是因为这些规则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人们还会被迫遵守另外一些规则,因为,尽管无视这样的规则可能会符合每个个人的利益,然而只有在这些规则为人们普遍遵守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得以成功所须依凭的整体秩序才会得以产生^[9]。很显然,哈耶克在

这里强调,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尽管区别于组织秩序,但却并不对那些作为行动者的组织(其中包括最大的组织即政府)予以排斥,而是认为国家的“规制性”行动也是有助于自生自发秩序之型构的。

村民自治从其作为一个由民政部倡导的示范性活动在广大中国乡村展开,到他作为一项正式的政治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植入,从总体上来看,它仍是一种高于传统乡村社会原有发展逻辑的外置之物,是农村社会严重失范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工具或手段引入的,因此村民自治实质上是一项由国家发起的“强制性变迁”,即强调国家(政府)的主导性,强调在短期内集中利用垄断性的政府权力资源和正式的组织构架由上至下的传递政策思想和方案,以迅速实现决策。在此意义上,村民自治俨然是哈耶克所谓的“人造的秩序”或“组织”。

首先,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一直是依靠占主导地位政府加以推动的,是由上而下制度供给的结果。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新兴事物虽然起源于农民的自发组织,但其上升为一项国家制度并在全国的农村迅速实施,其主要动力还是来源于国家权力的推动。特别是在当前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村社会在组织化程度、信息的获得以及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城市的时候,国家更有责任加大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支持和投入。例如,目前我国村民普遍缺乏关于治理相关问题的认识,因此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许多问题单纯依靠村民自治的内部力量是无法解决的,特别是民主选举的监督、村级财务的控制等方面,只有行政权的适当渗入和干预,才能保证村民自治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在此意义上,强制变迁就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所必需的。

其次,村庄必须依赖政府利用公共支出完成所需的纯公共产品的供给。村委会承担着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展集体经济的任务,但实际上村内的公共事务特别是一些需要大量公共投入的事业,单纯依靠村集体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行政权的干预和支持,即在农村治理过程中政府承担相应的经济扶持、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责。同时由于利己主义的个人理性的真实存在,必然会出现公共产品的搭便车效应。如果集体成员搭便车偏好强烈,搭便车效应将导致整个村庄处于无管理没安全的“自然状态”,即在纯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上,利用纯粹的市场交易的方式是失灵的、无效的,极端的情况是公共产品的边际供给为零。

可以说,无论是基于实现国家特别是农村现代化的考虑,还是为了实现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追求,

行政权都可以而且应该深入到农村社会的最基层，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合理的渗透和干预，实现村民自治是不可想象的。

3 内主外辅：两种村治秩序之间的内在关联

综观之，村民自治意味着一种非强迫的村治秩序，但它并不是自足的。与哈耶克的二元秩序观相对应，村民自治应一方面发挥个人选择和民间力量对农村治理的原始推动力作用，另一方面则借助于强大的政府资源的后续拉动力，才能使得村民自治能够迅速扩展。村民自治的自发生成与国家的强制性变迁双重维度缺一不可。

倘若政府权力完全退出乡村场域，让村民自治走完全自生自发的道路，那么由于国家放松管制或不作为，在政府责任严重缺位而村民又缺少自律精神和习惯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大量的放任无羁、一盘散沙的“瘫痪村”。马克思也曾对纯粹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进行批判过，认为自发秩序下的自由竞争、内部调节、自我进化，对于社会发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他的经济的盲目性、社会的无序和异化也会造成很大的灾难。自发竞争的秩序，并非就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公正、自由的发展，并非就能导致资源配置和再生产的平衡。

而村民自治的实现过程完全依靠强政府也是难以奏效的，甚至可能会使村民自治在襁褓中“畸形”成长。国家对村民事物过分干预，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设定了人们只需按计划 and 命令从事的既定秩序。这样便会限制乡村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导致村民主体地位和自主精神的丧失，形成一种臣服状态，造成了集权统治。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尽管在

一个自生自发的现代社会秩序中，公法有必要组织一种能够发挥自生自发秩序更大作用的架构，保护先已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和强制实施自生自发秩序所依据且遵循的部分规则，但是，作为组织规划的公法却绝不能因此而渗透和替代作为自生自发秩序所遵循的一部分内部规则的私法。以免内部秩序和植于其间的个人的行动自由蒙受侵犯并遭到扼杀^[6]。

外部秩序或组织虽然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或缺的治理工具，但是它却不能因此而侵扰甚至替代内部秩序的生成，否则自生自发的内部秩序和植根于其间的个人的行动自由就会蒙受侵犯并遭到扼杀。因此鉴于村民自治的发生学考察以及其自身的精神价值取向，村民自治必须强调内生变量的主导作用，并辅之以强制变迁的外部推动力，这样才能保证村民自治沿着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的道路加速前进，最终实现农村的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78.

[2] 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 张志铭,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107.

[3] 贺学峰. 当前村民自治与农村研究中需要澄清的若干问题[J]. 中国农村观察, 2000(2): 64-71.

[4] 科恩. 论民主[M]. 聂崇信,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60.

[5] 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44, 82.

[6] 邓正来. 规则·秩序·无知: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73, 207, 149.

[7] 米有录. 静悄悄的革命从这里开始—寻访中国第一个村委会[J]. 乡镇论坛, 1998(12): 6-8.

[8]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M]. 王明毅,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4.

冬季锻炼应注意的问题

- 1 谨防运动创伤 冬季，人体的肌肉、韧带在寒冷的刺激下黏滞性增加，使肌肉的弹性和伸展性降低。因此，锻炼项目可以跑步、快走、广播操、太极拳、韵律操为主，尽量不用铁制器械，每次锻炼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并防止损伤、摔伤等。衣着则要宽松、柔软、吸汗，不穿塑料底鞋。
- 2 呼吸方法须得当 冬季气候寒冷，风沙又大。因此，锻炼时不要大口呼吸，而应采用鼻腔或口鼻混合呼吸的方法，以减轻寒冷空气对呼吸道的不良刺激。
- 3 防止受寒冻伤 冬天锻炼，对暴露在外的手、脸、鼻和耳朵等部位，除了经常搓、擦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 环外，还应抹上适量的防冻膏、抗寒霜和油脂等，以防皮肤冻伤。锻炼中若出汗，要避免风吹，训练完毕应及时添加衣服，防止受寒和感冒。
- 4 掌握适宜运动量 锻炼中，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运动持续时间不宜过长，运动时心率应控制在每分钟 150 次以下。对患有心、肝、肾等脏器疾患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锻炼。
- 5 场地选择要适当 要选择路面平整，无结冰的避风、向阳地段。
- 6 恶劣天气应回避 遇到大风、下雪、寒流、大雾等天气时，要适时调整、变更锻炼项目和时间。

（吉林省大安市龙沼镇中学 张天刚）